

重读經典

新时代重要文献选读

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

——读习近平总书记《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

□ 童 萍

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6月24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收录在《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这篇重要文献深刻揭示了坚守初心使命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之间的本质联系,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刀刃向内、不断自我革命提供了行动指南和价值遵循。

初心使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和“魂”

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勇敢承担起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和坚定实践。

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理想,也是我们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对于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描

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在对生产力和财富全面占有的基础上,实现了基于个体差别的自我实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对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追求转化为初心使命,转化为理想信念和政治灵魂,把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统一,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

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党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为的是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为的是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为的是让中国人民富起来,让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团结带领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的是推动中华

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做到牢记初心使命必须勇于自我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为后继者所发展的,以反对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这就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固守已有结论的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质。这就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反映时代要求,引领时代潮流,在不断总结 and 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自我革命,惟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

勇于自我革命是党应对时代变局的必然要求。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外部发展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采取单边主义政策,不断在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等领域制造矛盾,妄图打击和遏制中国发展。

从国内来看,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三期叠加”的矛盾凸显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前所未有。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要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就需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勇于自我革命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和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坚强的保证。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已经解决的问题还可能反弹,新问题不断出现,“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

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历史挑战面前,必须牢记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向深入。

一是充分运用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党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自我革命经验和思想成果,如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等等,要充分运用这些经验和成果并不断发展。

二是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我们党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检视发现自身不足,做到知耻而后勇。”新时代更要坚持问题导向,以真刀真枪解决问题来推进自我革命。在政治建设方面,要确保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促进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净化政治生态,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在思想建设方面,要坚持不懈加强理论武装,强化党性修养,切

实解决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宗旨意识淡化等问题,不断增强全党同志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在组织建设方面,要健全党的组织体系,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在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方面,要坚持不懈整治“四风”,抓紧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铲除寄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永葆党的肌体健康。

三是做到“四个统一”。第一,要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发扬斗争精神,特别是要敢于同一切弱化党的领导、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争。第二,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既要坚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不动摇,同时要以新的理念、思路、办法、手段解决好党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提高自我革命实效。第三,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不断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既防止部分人乱作为,又充分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四,要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不但要发挥各级党组织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作用,而且广大党员、干部要主动检视自我,打扫身上的政治灰尘,不断增强政治免疫力。

四是抓住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带头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带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头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带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奋勇当先、实干担当。

当前,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唯有坚守初心使命,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座上无鸿儒,往来尽白丁』

——李景汉的治学之道

□ 黄家亮

李景汉(1895—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1928年,应晏阳初之邀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调查部主任,主持著名的“定县调查”,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1935年进入高校从事教育工作,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著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农村问题》等著作。李景汉的名字与社会调查是分不开的。通过扎实的社会调查掌握精确的社会事实,进而提出社会改造和建设的方案,并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他的治学之道。

“我是信仰社会调查的”

李景汉坚信“从事社会调查者本人对于调查工作有了信仰,才能感动别人亦对于调查有信仰”。正是将琐碎甚至枯燥的社会调查作为一种崇高的“信仰”,李景汉才为之付出坚韧不拔的努力和常人难以理解的热忱,一头扎进河北定县,在乡村做了长达八年的调查,铸就了“定县调查”这一学术史上的丰碑。此后,尽管世事纷乱,他始终没有放弃开展社会调查,甚至还撰文倡导“学术的旅行”,将每次旅行都作为社会调查的机会。

对于社会调查的坚定信仰萌生于李景汉早年在外国求学之时。在美国的课堂上,教师常会问及各国留学生所在国家人口的年龄、性别分布等情况,其他国家的学生往往都能对答如流,唯有他回答不上来,因此感到十分窘迫和内疚,以至于上课都不敢抬头。这类事情深深刺痛了李景汉,被他视为“国耻”,他决心回国从事社会调查:“做这个职业,我的目的是要把中国的人口、土地等情形都要记录下来,我是雪耻。中国的国耻是对自己的情形一概不知道,所以我回国中国,我要一生做社会调查。”在回国前,他还给自己立下了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给军阀当爪牙

的“三不”戒条。

1924年回国后,他当即投身于社会调查工作,先后在北京进行了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京郊农民家庭的调查以及人力车夫、手艺人、行会、普通人民生活费等调查。之后,他深感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在乡村,把调查的重点转到农村,开展了著名的定县调查。再后来,只要一有条件他就开展调查,在战乱时期的云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京郊,都做出了颇具影响的社会调查。为了坚守调查理想,他抵挡住了各种诱惑,甚至不惜得罪当时的军阀等权贵势力,也经受了疾病、战乱等考验。

晚年,他在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同事们回忆一生经历时,仍饶有兴致地谈到五十多年前朋友送给他的两副对联:一副上联是“一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十”,横批是“加减乘除”;另一副是“座上无鸿儒,往来尽白丁”,他自己加了一个横批,叫“我行我素”。由此可以窥见他当年的工作状态。

“最要紧最根本的是一个实字”

无论是开展调查研究,还是读书治学,李景汉最强调的是一个“实”字。他说:“作人要作到一个实在的人,要说实话,作实事,要切实,要笃实,要忠实,要诚实不欺,要充实有力,要实干,要脚踏实地,要实事求是,要朴实无华,要买卖踏实,讲学要讲实学,要讲到如实地步。”翻开李景汉的学术作品,随处可见的是各类数字、表格、事件,初读甚至有些枯燥,但正是这些“赤裸裸的事实”,使得他的研究具有可靠的基础和恒久的价值。

“事实是最好的证人,也是最有力的反驳者。”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例,里面呈现的多是各类事实,少见李景汉的主张和观点,但正是这些事实,使得这本书至今仍是认识那个时代华北乡村最为重要的文本之一。也正是在这些事实的

基础上,李景汉得出了土地问题为农村的根本问题,要通过节育、移民、增加生产等措施来解决农村人口过密问题,中国农村不能走工业资本主义道路、要注重发展农村手工业及农民合作经济等一系列理论灼见。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众多学者也将这些事实作为核心证据引用,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

李景汉从创造力、判断力的培养等方面强调对实求知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人生的最大贡献和价值是创造,如果不善于读书,非但不能提升,反倒削减了创造力,使自己的思想不知不觉跟着别人走。他认为,“我们处在大自然里与日常和社会的各方接触,也可以说是在读书”,因为读书的目的不外乎求知识、求真理,书不过是记叙事实的一种工具,从读书中获得的是古人的经验、知识、心得,而社会调查则是自己直接从实践中发现真理与事实。自己直接体验出来的知识和思想,才是创造,才是真有生命的东西。

他还特别强调读书必须要有判断力,无论读多少书,要能始终维持我们的主人地位,即思想自由、创造自由。他认为一本书有三个方面最值得注意:一是内容,须要完全真实,言之有物而不空洞;二是写法,要清楚利落,有条理;三是文字,要叙述得辞句生动。其中第一点为首要,为要达到真实的目的,即使牺牲了“写法”和“动人”也在所不惜。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不是为调查而调查”

虽然痴迷于社会调查,但李景汉始终认为“如果只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最好不举行调查,举行调查必有一定清楚的目的”。他的志向是要把现代社会调查法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切实反映中国国情,给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士仁人们提供材料。具体来说,这种志向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造社会,即“使人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来改善社会



李景汉(左二)主持的定县调查团队工作照

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二是推进社会学的本土化,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出生和成长于风雨飘摇、民族危亡的时代,李景汉与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一样,怀有强烈的救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他反对空喊口号,主张要“多用理智、少用情感”,要先把现状和事实搞清楚。他认为,中国实有其不可磨灭之固有精神与文化,只有通过细密的调查研究,才能认清中国之本来面目,保存和发扬其优点、美德,并铲除其劣点、恶习,而不能停留于“举凡不合某人之心或不合某派之意者,统在打倒之列”。这样看似热闹,但结果则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反而大受其罪。他主张要通过社会调查掌握事实,搞清楚何者确应打倒,如何才能打倒,打倒之步骤为何,“谁认清了现实,谁就是时代的主人、时代的向导;谁远现实,谁就是时代的附庸、时代的渣滓”。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祝贺李景汉执教六十周年暨九十寿辰”

座谈会上,李景汉仍壮心不已,提出了中国社会学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设想。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曾尖锐地指出“中国现在所用的社会学课本皆为洋文原本,或译本,纯为外国社会之材料”的问题,提出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发展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他的社会调查,就为推进社会学本土化作出了杰出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仅体现在积累了大量本土的、系统的资料上,而且在于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社会建设的一系列真知灼见,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调查方法。体现出中国社会学家最初的方法论自觉和艰辛探索,是中国社会学界的宝贵财富。

马克斯·韦伯在那篇经典演讲《以学术为业》中讲到:“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没有这份热情,……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回望李景汉的治学历程,不难发现,他所坚持的就是这一份沉浸在社会调查中的“陶醉感”,伴随着他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献出一生的热情。